

·经济与社会·

老年人生产性劳动供给 对生活满意度综合指数的影响探究

——基于2018年CHARLS数据的检验

陆杰华 郭荣荣

摘要:在老龄社会新形态格局下,老年人积极参与生产性经济活动对于实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基于2018年CHARLS调查数据,研究分析了老年人参与生产性经济活动的劳动供给状况及其个体特征差异。通过构建生活满意度综合指数,发现劳动供给降低了老年人的满意度指数,但该负面影响随家庭消费支出增加、享有优质的居家社区养老服务 etc 个体资源禀赋的优化而有所减弱;同时延长劳动时间显著提升了生活满意度指数。基于积极老龄观视角,从存量提质、挖掘增量两方面对促进老年人劳动供给和提升生活满意度提出可干预举措。

关键词:老年人劳动供给;劳动参与;生活满意度指数;积极老龄观

中图分类号:D669.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4088(2023)01-0094-12

DOI:10.15993/j.cnki.cn35-1198/c.2023.01.018

一、引言

2021年11月国务院《关于加强新时代老龄工作的意见》(下文简称“《意见》”)将“促进老年人社会参与”作为独立章节,提出“从探索老年人灵活就业模式、为老年人提供职业介绍技能培训和创新创业指导服务”等方面,鼓励老年人将老有所为同老有所养相结合,并且全面清理阻碍老年人继续发挥作用的不合理规定。^[1]事实上,《2002年马德里老龄问题国际行动计划》的首要建议是“老年人与发展”,提出承认老年人贡献、为所有想要工作的老年人提供就业机会,此计划成为近20年来与会国有关老龄问题的思维和行动指南^①。老年人积极参与生产性经济活动属于“老年人社会参与三层次”^②中的第一层次,既是个体适应老年生活的主观能动选择,也是国家和社会解决老龄问题的战略举措。

一方面,鼓励发挥老年人口生产潜能的外部推力是收获数量型人口红利难度逐步加大且劳动力蓄水池依然充盈的同时有所收缩。2019年我国15岁以上人口劳动参与率达75.6%,远高于世界平均水平66.4%,与高收入国家的73.6%相近。2010—2019年该指标下降了4.8个百分点,年均下降率达0.6%,高于世界平均水平劳动参与率年均下降率0.4%^③。由此可见,我国总体劳动参与率水平处于高位,但却呈加速下行趋势。与此同时,劳动力老化态势日趋严重,2000—2020

收稿日期:2022-11-15

基金项目:北京市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实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研究”(项目编号:20ZDA32)。

作者简介:陆杰华,博士,北京大学中国社会与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社会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为人口社会学、老年人口学。

郭荣荣,北京大学社会学系博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为人口社会学。

年间劳动力老化水平的平均年增长率为0.76%^[2],老龄社会新形态的格局已经形成且不可逆转^[3]。另一方面,鼓励发挥老年人口生产潜能的内在动力是老年人劳动能力和劳动意愿提升带来的客观就业需求。2020年第七次人口普查数据显示,60—69岁低龄老年人口占老年总人口比重过半,达55.83%^[4],其中60—64岁老年人口占比为27.8%,潜在劳动利用率高。同时随着卫生健康事业高质量发展和推进老年健康服务与医养结合,老年健康水平进一步提高^[5];并且拥有高中及以上文化程度的老年人口占全体老年人口的13.9%,劳动能力亦有所增强。2010—2019年60岁及以上就业人员占全体就业人员的绝对比重由7.5%上升至10.3%,同比增长率维持在2%水平上^[6]。因此,老年群体的经济独立性和自养能力逐步提高^[6],收入来源结构呈现“老有所养”和“老有所养”并存且渐趋并重的特征。

“提升广大老年人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是新时代老龄工作的目标定位,其中幸福感是三者的核心,意涵满足老年人多层次需求。作为幸福感的认知性因素^[5],生活满意度直接反映了各项民生服务质量及个体需求得到满足时产生的主观评价,是期望生活和现实感知对比的结果,所以是评价养老生活质量的综合指标和判断老年心理健康的有效方法^[7]。

基于以上背景,本研究利用微观调查数据,在捕获分析老年人劳动参与状况及其个体特征的基础上,选取生活满意度各项测量指标并赋予权重构建综合指数,探讨老年人劳动参与与否、参与类型和劳动时间对生活满意度综合指数产生了何种影响效应,该效应是否因个体资源禀赋的差异而有所强化或减弱。

二、相关文献回顾与评述

1. 核心概念界定

劳动供给是可获得的劳动者愿意提供的劳动能力的总和,分为劳动广度和劳动深度,前项指是否参与劳动、后项指劳动时间长度^[8]。借鉴该界定同时结合老年人参与生产性经济活动的现实状况,老年劳动供给则指具有劳动能力和劳动愿意,且参与有报酬或无报酬的商品生产、服务供给等生产性经济活动的老年人提供的劳动能力的总和,具体包括劳动参与与否、劳动参与类型和劳动时间。劳动供给主体涵盖城市达到退休年龄的老年人和农村老年人;劳动供给类型包括为自家或受雇从事农业活动、从事个体与私营经济、非农受雇、不拿工资为家庭经营帮工等,但不包括家务劳动。生活满意度评价是个体对社会事实的心理映射和对切身体验较为理性的认知判断,如医疗服务、政府廉洁、生态环境等,是基于自我选择来度量生活质量的比较综合和可测量的指标。故“老年人生活满意度”是指老年人对个体生活质量和所处社会环境的综合性评价,反映了期望生活和实际感知状况的比较,具有相对理性判断和事实导向的特点。

2. 老年人劳动供给对生活满意度影响的研究概况

既往关于老年人参与生产性经济活动的研究集中在三个方面:一是将有劳动能力和劳动意愿的老年群体作为劳动力,总结劳动供给现状、分析制约困境和提出发展路径等。例如,研究主体聚焦城市已退休的再就业老年人和农村老年人,发现二者分别对应退而不休^[9]和无休^[10]两种劳动状态,呈现出前者“就业无门”和后者“被迫劳动”的特征,存在着城市老年人“低就业率和高就业意愿”与农村老年人“高劳动就业率和低劳动参与能力”的双重矛盾^[11]。二是将老年人作为微观个体,探讨个体资源禀赋对劳动参与意愿和劳动供给状况的影响。劳动参与动机包括经济需要、家庭理性、发挥余热和实现老年价值等^{[12][13]};显著性影响因素涉及个体及家庭特征因素,如经济状况、受教育程度、是否享有养老金和医疗保险、健康水平等^{[14][15]},以及社区提供的居家养老服务和设施条件、行业技术进步、法律权益保障范围等^{[16][17]}。三是将老年劳动供给作为一种社

会参与和践行老有所为的行为模式,研究其对个体角色转换后的社会适应性和发挥的社会功能的影响。其中结论包括退休老年人的社会参与程度对其社会适应状况有显著的正向影响^[18];践行产出性老龄化和老有所为有利于提高个体的主观幸福感和实现自我价值^[19];老年人参与不同类型社会活动的经济意义体现在促进开发老年人人力资源、构建自身老年资本,精神意义体现在提升老年心理健康水平、实现精神寄托、减少孤独感^[11]。

聚焦老年劳动供给与生活满意度的关系研究,因测量方法、样本选取的差异并未形成统一的结论:其一,当前研究多利用单一指标测量满意度状况,以“您觉得现在生活怎么样”进行衡量。研究发现老年人的主观生活质量水平高于客观,且主观因素在生活质量评价中的权重越来越大^{[20][21]};近年老年人的生活满意度稳中有升,对各项民生服务的总体主观评价基本处于好评区间,城乡老年人口生活满意度差异在缩小^{[22][23]}。其二,影响老年人生活满意度的宏观因素涵盖城乡政策环境、民生服务改善水平、医疗资源可及性等^{[24][25]};中观因素涉及社区提供的居家养老服务水平和设施完善程度、社会支持和社会信任等^{[26][15]};微观因素包括人口学特征、家庭消费水平和结构、居住安排、社会适应性等^{[27][28]}。其三,老年人参与生产性经济活动对其生活满意度有正向促进效果的研究结论多源自对老年亚群体或区域群体的定性研究,如吉林省城镇退休后再就业老人的生活质量主观评价高于居家老人^[29];农村老年人从事乡村建筑行业在弥补乡村劳动力缺失的同时扩展了朋友圈、缓解孤独感^[30];对香港老年人再就业状况的研究发现,重新参与生产性活动有利于提高退休后的角色适应性和实现自身价值^[31]。其四,劳动供给会降低老年人生活满意度的研究结论主要基于大样本的调查数据经量化研究所得,如退而不休对老年人生活满意度有显著的负向影响^[9];出于家庭理性和经济利益考虑而延长劳动时间对农村老年人的生活质量有负面影响,被动的劳动参与不利于提高满意度评价^[32]。其五,对二者关系起到调节作用的因素涉及健康状况、收入水平和闲暇时长等,如获得工资性收入、延长闲暇时长可以正向调节劳动参与对老年人各项满意度产生的负向影响^[10]。同时因幸福经济学领域通常以主观效用来衡量幸福感、满意度等,而效用被假定为消费的函数,随消费水平增加和消费结构优化,主观效用亦随之提升^[33]。已有研究发现消费差异能够直接或间接通过形成相对剥夺感降低老年人的主观生活质量^[34],享受型消费对居民幸福感有显著正向影响等^[35]。

3. 研究评述

以往研究对本研究探讨老年人劳动供给对其生活满意度的影响效应具有积极借鉴意义,然而其并不能完全满足随着老年人劳动能力和劳动意愿提升对合理开发利用银发劳力提出的新要求。具体表现为:其一,劳动供给主体的研究范围有限,例如针对城市已退休老年人、城市中低龄老年人、农村老年人等亚群体,涵盖全体老年人的研究较少。其二,对劳动参与的定义局限于退休后再就业,即从事受雇工作取得经济收入;很少将老年人参与的无报酬经济活动纳入其中,如自家务农或为家庭经营帮工,存在低估老年劳动参与率和劳动价值的可能性。其三,变量指标选取较为单一,多使用“是否参与劳动”和“对生活的总体满意度”单项指标分别衡量劳动供给和生活满意度,欠缺对劳动参与类型和劳动时间对生活满意度综合指数的探讨。本研究对上述不足予以弥补:选取的研究对象为60岁及以上全体老年人,劳动供给类型涵盖了有报酬和无报酬的经济活动,并尝试构建了对二级指标进行赋权加总后的综合指数,以完善现有研究图景。

三、研究设计

1. 数据来源和变量说明

采用2018年中国健康与养老追踪调查(CHARLS)数据,调查家户问卷的内容涵盖基本信

息、家庭、健康状况和功能、医疗保健与保险、工作和退休、收入支出与资产等。通过删除 60 岁以下和关键变量缺失的样本,对非核心变量存在缺失值的样本采取了计算样本均值替代的方法,最终样本数量为 9385。

被解释变量为生活满意度综合指数,通过对各领域满意度评分进行赋权加总所得。基于上述对“生活满意度”的概念界定,借鉴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中国民生指数研究”课题组对民生主观(满意度)指数的划分^⑥,参考相关实证研究成果^{[36][37]},最终构建了包括 3 个一级指标(家庭生活、公共服务、生态文明)、6 个二级指标的老年人生活满意度指数。操作化以问卷中“您对自己的生活/婚姻/子女关系/健康/本地医疗服务/空气质量是否感到满意”6 个问题衡量,将回答“极其满意、非常满意”赋值为 1,“比较满意、不太满意、一点也不满意”赋值为 0。核心解释变量为老年人劳动供给,包括劳动参与与否、劳动参与类型和劳动时间 3 个二级变量。问题涉及:(a)自家务农,过去 1 年,您有没有为自家从事农业生产经营活动,并且至少 10 天以上?(b)受雇务农,过去 1 年,您有没有为其他农户或雇主干农活挣钱,并且至少 10 天以上?(c)非农劳动,除去与务农有关的工作,上周您有没有工作至少 1 个小时?(d)在您办理了正式退休/提前退休/内退/退职之后,您是否工作过?(e)您这辈子是否曾经工作了至少 3 个月的时间?^⑦借鉴已有实证研究^{[13][29]},变量具体设定为:(1)关于是否参与劳动,将(a)(b)(c)(d)只要有一项回答“是”,即定义老年人存在劳动参与行为,赋值为 1;将(a)(b)(c)均回答“否”或(e)回答“否”,定义为不参与劳动,赋值为 0。(2)关于劳动参与类型,将(a)或(b)回答“是”定义为从事农业劳动,赋值为 1;将(c)回答“是”定义为从事非农劳动,赋值为 2;将无工作赋值为 0。(3)关于劳动时间,将问卷中“过去 1 年中,您有几个月为自家务农”和“过去 1 年中,受雇工作您一共干了几个月”两个问题回答的月份进行加总(详见表 1)。

表 1 核心解释变量、被解释变量的描述性统计

变量	变量描述	定义变量	频率 (%)	均值	标准差	N
核心解释变量						
劳动参与 与否	(1) 是否工作过	是=1	51.83	0.52	0.50	9385
		否=0	48.17			
劳动参与 类型	(1) 无工作	无=0	47.84	0.65	0.69	9385
	(2) 农业劳动	农业=1	39.54			
	(3) 非农劳动	非农=2	12.62			
劳动时间		单位: 月数/年	—	3.95	5.10	9385
被解释变量: 生活满意度综合指数 (利用 CRITIC 赋权法将下列六项满意度赋权加总)						
家庭生活 满意度	(1) 对生活总体满意度	满意=1	36.99	0.37	0.48	9385
		不满意=0	63.01			
	(2) 对婚姻满意度	满意=1	39.77	0.40	0.49	9385
		不满意=0	60.23			
公共服务 满意度	(3) 对子女关系满意度	满意=1	55.50	0.56	0.50	9385
		不满意=0	44.50			
	(1) 对自身健康满意度	满意=1	26.73	0.27	0.44	9385
		不满意=0	73.27			
生态文明 满意度	(2) 对本地医疗服务质量、成本和方便程度满意度	满意=1	41.78	0.42	0.49	9385
		不满意=0	58.22			
	(1) 对今年空气质量满意度	满意=1	33.92	0.34	0.47	9385
		不满意=0	66.08			

控制变量则根据文献回顾中“影响老年人生活满意度的宏、中、微观因素总结”和“老年劳动供给与生活满意度二者间的调节因素”,设置为个体特征、经济状况、社会保障、休闲活动 4 项。详细的描述性统计见表 2,回归分析中对年龄、家庭月消费支出、自付药费数额做对数处理。

2. 分析策略

其一,使用 CRITIC 方法(Criteria Importance Through Intercriteria Correlation)确定生活满

表2 控制变量的描述性统计

变量	变量描述	定义变量	频率 (%)	均值	标准差	N
个体特征	(1)性别	男=1 女=0	48.93 51.07	0.49	0.60	9385
	(2)年龄	单位：岁 高中及以上=2	— 9.45	68.72 0.79	0.71 0.59	9385 9385
	(3)受教育程度	初中及小学=1 未受教育=0	60.54 30.01			
	(4)居住地	城镇=1 农村=0	25.23 74.77	0.25	0.43	9385
	(5)自评健康状况	较好=2 一般=1 较差=0	20.87 47.88 31.24	0.90	0.71	9385
	(6)婚姻状况	共同居住=1 其他=0	79.67 20.33	0.80	0.40	9385
	(1)家庭消费支出	单位：元/月 是=1 否=0	— 13.38 86.62	1673.33 0.13	2283.66 0.34	9385 9385
	(2)是否有工资					
	(1)是否领到转移支付	是=1 否=0	85.56 14.44	0.86	0.35	9385
	(2)是否参加医疗保险	是=1 否=0	97.06 2.94	0.97	0.17	9385
经济状况	(3)自付药费数额	单位：元/月 是=1 否=0	— 21.35 78.65	263.72 0.20	570.63 0.40	9385 9385
	(4)是否享有居家社区养老服务					
	(1)是否参与休闲活动	是=1 否=0	48.49 51.51	0.48	0.50	9385

意度各指标权重,以构建综合指数。CRITIC法以评价指标间的变异性和冲突性为基础,相较于标准离差法和熵权法客观赋权法更能有效反映指标的主客观信息^[38]。基本思路是:在对数据进行标准化处理的前提下,以变异性和冲突性为基础确定权重:前项表示同一个指标各个评价对象之间取值差距的大小,以标准差来表现,值愈大即各评价对象之间取值差距越大;后项以指标之间的相关性为基础,如两个指标之间具有较强的正相关,说明两个指标冲突性较低。公式1和公式2分别是确定第j个指标的信息量和第j个指标的权重:C_j表示第j项指标所包含的信息量,其值越大表示该指标的相对重要性越大;σ_j为指标j的标准差;r_{tj}为指标t和j之间的相关系数;n为所有指标的数量;W_j为第j个指标的客观权重。权重确定后,根据公式3(y_j为标准化处理后的第j个指标的观测数据),对各指标进行加权平均,得到生活满意度的最终指数Sat_{index}。

$$C_j = \sigma_j \sum_{i=1}^n (1 - r_{ij})$$

(公式1)

$$W_j = \frac{C_j}{\sum_{j=1}^n C_j}$$

(公式2)

$$Sat_{index} = \sum_{j=1}^n W_j \cdot y_j$$

(公式3)

其二,使用多元线性回归模型分析老年人劳动供给对其生活满意度综合指数的影响效应。模型设定如下,其中Sat_i表示个体生活满意度指数;β₁、β₂、β₃分别表示劳动参与与否、劳动参与类型和劳动时间对生活满意度指数的影响系数;Z_i代表其他所有控制变量、γ是其影响系数;ε代表随机误差项。

Sat_i=β₁working_i+β₂workingtype_i+β₃workingtime_i+γZ_i+ε

3. 生活满意度指数赋权结果

由CRITIC赋权法计算的各项满意度权重结果见表3,6项二级指标中“对婚姻的满意度”权重最高,达25.65%;其次是“对本地医疗服务质量、成本和方便程度的满意度”,比值达20.46%;再次是“对自身健康状况的满意度”值为14.77%;“对生活总体的满意度”项权重最低为12.01%。权重结果与老年人实际生活状况和已有研究成果较为符合:家庭是老年人最依赖和活动地点频次最高的空间,配偶是老年人最重要的同伴^[39];医疗保险和医疗服务具有隐形福利的货币价值,约

为年收入的24.58%,能够显著促进居民的主观幸福感^[40];健康是影响老年人参与各类活动的最重要变量,自评健康良好的老年人对生活满意度评价高的几率是自评健康较差者的5.2倍^[41]。

表3 基于CRITIC赋权法计算的各项满意度权重结果

项	N	指标变异性	指标冲突性	信息量	权重	赋权后均值
对生活总体	9385	0.809	3.423	2.77	12.01%	0.33
对子女关系	9385	0.820	3.717	3.05	13.22%	0.33
对婚姻	9385	1.421	4.162	5.91	25.65%	0.8
对医疗服务	9385	1.133	4.163	4.72	20.46%	0.54
对自身健康	9385	0.945	3.603	3.40	14.77%	0.45
对空气质量	9385	0.834	3.844	3.21	13.90%	0.39

四、实证分析结果

1. 老年人劳动供给的个体特征差异

老年人劳动参与的总体状况表现为:样本中超半数(51.83%)的老年人参与生产性经济活动;其中有近四成从事农业生产,人数是从事非农劳动老年人的三倍之多;年均工作月数为3.95,即每年约工作一季度(详见表1)。个体特征差异表现为:(1)老年劳动力的年龄分布集中于60—69岁,老年男性劳动者占比高于女性劳动者约13个百分点。(2)各年龄段老年劳动力从事农业劳动的占比均高于非农劳动,尤以70—79岁群体参与农业生产的人数占该年龄段劳动总人数比重最大。(3)受教育水平较高老年人的劳动参与率有待提升,高中及以上学历的老年劳动参与率低于未接受教育群体近20个百分点。(4)居住在农村的老年人劳动参与率高(约为城镇的3.5倍)且集中于农业劳动,而城镇则参与率低且主要从事非农工作。(5)健康状况较差的老年人中仍有43.11%的群体参与劳动;非农工作的劳动参与率随个体受教育水平提升和自评健康状况优化而有所提升(详见表4)。

表4 老年人劳动参与的个体特征

		劳动参与与否, 频率%			劳动参与类型, 频率%		
		是	否	频率差值	农业劳动	非农劳动	频率差值
年龄	60—69岁	60.75	39.25	21.5	43.50	17.60	25.9
	70—79岁	42.10	57.90	-15.8	37.23	5.09	32.14
	80岁及以上	25.95	74.05	-48.1	22.04	4.45	17.59
受教育程度	未接受教育	54.08	45.92	8.16	47.12	7.10	40.02
	初中及小学	53.17	46.83	6.34	39.05	14.43	24.62
	高中及以上	36.08	63.92	-27.84	18.60	18.49	0.11
性别	女	45.82	54.18	-8.36	39.39	6.74	32.65
	男	58.10	41.90	16.2	39.70	18.75	20.95
居住地	农村	63.18	36.82	26.36	50.22	13.04	37.18
	城镇	18.20	81.80	-63.6	7.90	11.36	-3.46
自评健康状况	较差	43.11	56.89	-13.78	37.11	6.31	30.8
	一般	54.90	45.10	9.8	41.66	13.60	28.06
	较好	57.84	42.16	15.68	38.34	19.81	18.53

注:频率=频数/所在组观察值*100%,例如60—69岁组中参与劳动人数占该年龄组人数的60.75%。
频率差值=各行劳动参与“是”频率-劳动参与“否”频率;从事农业劳动频率-非农劳动频率。

2. 全样本回归结果

表5列出了老年人生产性劳动供给对生活满意度综合指数影响的分析结果,模型1仅纳入核心解释变量,结果显示参与劳动对老年人的生活满意度指数产生了1%水平的负向效应。在劳动参与类型方面,相比从事非农工作群体,从事农业工作的老年劳动者更有可能产生较高的满意度指数。劳动时间则正向影响被解释变量,其对数每增加一个单位、满意度指数提高0.1%。

模型2、3、4、5分别在模型1的基础上纳入了个体特征、经济状况、社会保障、休闲活动,使得核心解释变量的影响效应发生了变化。模型5全样本回归结果显示劳动参与与否和劳动类型对被解释变量依旧产生负向影响,但影响水平不再显著;而劳动时间对满意度指数的提升效应则由模型1中的不显著转化为5%水平上的显著性。

表5 老年人生产性劳动供给对生活满意度指数影响的多元线性回归结果

变量	模型1	模型2	模型3	模型4	模型5
劳动参与与否	-0.114 ^{***}	-0.049 [*]	-0.034	-0.030	-0.030
劳动参与类型	-0.051 ^{**}	-0.001	-0.011	-0.012	-0.012
劳动时间	0.001	0.004 ^{**}	0.003 ^{**}	0.004 ^{**}	0.004 ^{**}
性别		-0.037 ^{***}	-0.037 ^{***}	-0.037 ^{***}	-0.038 ^{***}
年龄		-0.305 ^{***}	-0.294 ^{***}	-0.264 ^{***}	-0.265 ^{***}
受教育程度		0.087 ^{***}	0.085 ^{***}	0.087 ^{***}	0.087 ^{***}
居住地		0.067 ^{***}	0.058 ^{***}	0.058 ^{***}	0.058 ^{***}
自评健康状况		-0.263 ^{***}	-0.263 ^{***}	-0.254 ^{***}	-0.254 ^{***}
婚姻状况		-0.649 ^{***}	-0.650 ^{***}	-0.650 ^{***}	-0.651 ^{***}
家庭消费支出			0.025 ^{**}	0.022 [*]	0.022 [*]
是否有工资			0.016	0.017	0.017
是否领到转移支付				0.002	0.002
是否参加医疗保险				-0.063 [*]	-0.063
自付药费数额				0.077 ^{***}	0.077 ^{***}
是否享有居家社区养老服务				-0.071 ^{***}	-0.071 ^{***}
是否参与休闲活动					-0.002
_cons	2.926	4.822	4.767	4.693	4.697
Adj-R ²	0.019	0.260	0.260	0.264	-0.071 ^{**}

注:“*”“**”“***”分别表示在10%、5%、1%的水平下显著。

对上述结果解释为:(1)针对老年人参与劳动与满意度指数间的负相关关系,与姜向群^[32]、黄文杰^[9]、聂建亮^[10]等研究发现相一致,一定程度上体现了“就业功能论”所认为的就业具有满足个体基本心理需求的潜功能,无法解释老年人“无休”状态下的低生活满意度评价。这一方面源于老年人参与劳动的主要动机是家庭理性和经济需求,可能存在迫于经济压力的强迫性劳动和改善生活质量的无奈之举。另一方面,老年劳动者主要从事高体力要求的低技术行业,亦会增加身体负担引发健康问题,从而降低晚年的福利状况。(2)针对劳动参与与否和劳动参与类型对被解释变量产生的负向影响,回归结果表明在加入全部控制变量后,弱化了负相关效应。劳动参与变量的负系数的绝对值由模型1中的11.4%降低至3%,且已不存在统计意义上的显著差异。这意味着四类控制变量已基本解释了老年人参与劳动带来的生活满意度指数差异,鉴于此,进一步按照其中可干预的个体资源禀赋分类,分析各类人群参与劳动对其生活满意度产生的影响。(3)针对劳动时间愈长、生活满意度愈高的现象,映射出收入是驱动满意度提升的基本动因。与周绍杰^[25]、高敏^[28]等研究结果相呼应,说明基于我国的发展阶段与现实国情,劳动时间延长带来的经济收入增加仍是提高生活满意度的内在动力^[36]。这使得工作型老年人的经济独立性逐步提高,对家庭供养的依赖性减弱,能够丰实养老资本的同时实现个人独立、自由、平等的价值观念,因而提升了理性幸福值。

3. 异质性分析

老年劳动群体的生活理性降低了其生活满意度,从可干预的个体资源禀赋对其影响效应进行分类,有利于提高政策举措的针对性和养老资源利用的有效性,降低影响老年劳动群体主观生活质量评价因子的负作用。表6显示,分类后的控制变量均在1%显著性水平上,对老年人生产性劳动参与和生活满意度指数间的影响系数发生作用。此外,资源禀赋的差异并未影响劳动

参与对生活满意度的负效应,亦验证了表5回归结果的稳定性。具体而言,一方面,从劳动参与与否变量来看,对负影响系数起到最大提升效果的是家庭月消费支出。相较于低家庭消费支出,具有较高家庭月消费支出弱化了老年人参与劳动对其生活满意度指数的负面影响。家庭消费支出对数每增加1个单位、负面影响效应减弱10%。其次是享有居家社区养老服务和参与休闲活动,老年劳动群体若能享受到高质量的居家社区养老服务和均衡劳动休闲时间丰富休闲活动类型,能够在7%程度上降低其产生低满意度评价的可能性。再次是领到转移支付在5%程度上减弱了参与劳动对生活满意度指数的负面效应。另一方面,从劳动参与类型来看,家庭月消费支出较高、具有工资收入、自评健康状况良好的个体特征,能够弱化参与非农工作对生活满意度评价的负面影响,对系数提升分别起到8%、7%和6%的作用。其余变量也在4%—5%程度上减弱了参与非农工作对生活满意度指数的负面效应。

表6 按个体资源禀赋分类的老年人劳动参与对生活满意度指数的影响效应

资源禀赋分类	具体描述	定义	劳动参与与否-生活满意度影响系数	系数提升	劳动参与类型-生活满意度影响系数	系数提升
健康状况	(1) 自评健康状况	较差=0 较好=1	-0.16*** -0.12***	0.04	-0.12*** -0.06***	0.06
	(2) 自付药费	较低=0 较高=1	-0.15*** -0.19***	-0.04	— —	—
经济状况	(1) 家庭消费支出	较低=0 较高=1	-0.21*** -0.11***	0.1	-0.15*** -0.07***	0.08
	(2) 是否有工资	否=0 是=1	— —	—	-0.14*** -0.06***	0.07
	(3) 是否领到转移支付	否=0 是=1	-0.22*** -0.17***	0.05	— —	—
	(4) 是否享有居家社区养老服务	否=0 是=1	-0.19*** -0.12***	0.07	-0.13*** -0.09***	0.04
	(5) 受教育程度	较低=0 较高=1	— —	—	-0.15*** -0.1***	0.05
	(1) 是否参与休闲活动	否=0 是=1	-0.21*** -0.14***	0.07	-0.14*** -0.1***	0.04

注:“***”表示在1%水平上显著相关。

对上述结果中能够明显弱化负面效应的个体资源禀赋的解释为:(1)家庭月消费支出无论是在劳动参与与否抑或参与类型变量中,皆对负影响系数起到了最大提升效果。一方面,消费支出数额反映了消费水平的高低,已有研究发现家庭基本生活消费支出增加1%,个人幸福感显著增加0.091%^[33]。作为影响老年人理性幸福感的货币因素,消费水平的提高带来个体主观效用的增进,进而能够调节老年人参与劳动对生活满意度综合指数的负面影响效应。另一方面,家庭消费支出愈多,意涵其多样化的消费需求得到满足的可能性愈大,享受型消费有一定规模占比,消费结构有所优化。相较于解决温饱问题的生存型消费和扩大再生产所必需的发展型消费,享受型消费是为了提高主观效用水平进行的非必要消费,其收入弹性更大,因此对主观生活质量评价有显著提升作用。(2)社区生活圈一方面是存在于物质空间中的设施圈,目前我国老年人对居家养老服务的使用集中在与日常生活密切相关的生活照料服务上,不仅能够发挥对高龄、失能、独居等重点老年群体的兜底保障作用^[42],也能够提高健康老年人自发参与社会活动的积极性。另一方面亦是存在于个体感知空间里的社交圈,社区提供的丰富的娱乐活动、老年大学、托老所等服务有利于减少老年人的孤独感和疏解参与生产性劳动带来的负面情绪。(3)老年劳动群体休闲参与种类增多和休闲参与时间增加,意味着其更易达到“劳逸结合”的状态,确保在获得生活资料和收入的同时满足社会交往的需要。相较于因延长劳动时间而挤压了休闲时间的老年劳动者,对二者时间调配得当并收获较高休闲活动体验感的群体,其就业品质和生活满意度结果更为可观。

五、结论与讨论

《关于加强新时代老龄工作的意见》作为实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的顶层设计和老龄工作的纲领性文件之一,贯穿其始终的一个主线是将积极老龄观、健康老龄化理念融入经济社会发展全过程,该主线也是习近平总书记对新时代老龄工作提出的要求。新时代“积极老龄观”意涵既要充分认识人口老龄化带来的问题和挑战,更要深入挖掘老龄社会潜能,激发老龄社会活力;积极地看待老龄社会、老年人和老年生活,创造一个老年人能充分发挥作用的社会环境。

本研究试图完善在实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和形成老龄社会新形态格局的背景下,老年人生产性劳动供给对生活满意度综合指数影响的研究图景。总体上看,本研究结论如下:

第一,60岁及以上群体中有超半数参与生产性经济活动,且在劳动参与与否和劳动参与类型上存在个体差异。样本中参与劳动的老年人比例达51.83%;年均工作月数为3.95月/年;各年龄段老年劳动力从事农业劳动的比例均高于非农劳动;居住在农村、受教育水平低的老年人劳动参与率显著高于居住于城镇、受教育水平较高的群体;非农工作的劳动参与率随个体受教育水平提升和自评健康状况优化而有所提升。这与黄宏伟、李江一、慈勤英等研究结果一致,即从事农业或非农劳动的老年人占样本老年人口总数50%以上^{[43][44]},老年人是否退出劳动力市场的行为在不同性别、身体状况、受教育状况的群体间存在差异^[8]。

第二,相较于无劳动参与行为,参与生产性劳动降低了老年人的生活满意度指数,但该影响不显著。这在一定程度上回应了老年人参与劳动对其心理健康水平的相关结论^{[45][46]},在以经济需求为劳动参与驱动力的前提下,从事零工或农业劳动难以改善老年人的心理健康状况和提升主观福祉水平。

第三,老年人劳动参与对满意度综合指数的负面影响随个体资源禀赋的优化而有所减弱。较高的家庭消费支出、享有高质量的居家社区养老服务、均衡劳动休闲时间丰富休闲活动类型,对降低影响劳动主体生活满意度评价因子的负作用具有显著效果。

第四,老年人的劳动时间对其生活满意度指数有显著的正向促进效果。这与既有研究结论有所呼应,即工作时间在达到拐点以前,延长劳动时间能够实现对劳动者的幸福感和生活满意度的最大化。^[47]

基于积极老龄观视角,在促进老年劳动供给和提升生活满意度方面的表现为,满足有劳动能力和劳动意愿的老年人日益增长的参与生产性经济活动的美好生活需要。通过开放老年人就业岗位和渠道、改善老年人就业环境和提高老年人自身能力建设,以提高老年就业质量和减少老年人力资源浪费,提升广大老年劳动者的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由此针对上述研究结果提出相应的干预举措:

首先,针对与非劳动群体相比,老年劳动群体的生活满意度指数较低,且集中于从事农业劳动的现象,应实施专项立法保护老年劳动者的劳动权利、改善就业环境和提高就业质量。以现有劳动法律体系为基础,基于分层保护理念,授权国务院及相关部门对老年人再就业进行专项立法^[17],以保证老年再就业者继续享有劳动权益和受到劳动市场的庇护。在就业环境方面,鼓励用人单位与老年劳动者之间建立弹性、灵活的劳动用工关系,建立公平合理、按劳分配的报酬机制。同时采取措施保证老龄劳动者有充分的继续教育和培训的机会,维持并开发其工作能力和技能。针对农村老年群体,在结合本地特色与发展状况、大力发展乡村特色产业,以提高务农老年人工资性收入的同时,大力推进土地流转制度,以增加其财产性收入。倡导农村劳动力就地、就近和返乡就业、创业,吸引高素质劳动力从事农业生产,加快发展现代型农业生产,减轻农

村老年人的劳动负担。

其次,针对劳动时间对生活满意度指数具有显著促进效果的现象,应优化老年人经济来源结构和合理控制劳动时间。着力改善构成老年人主要生活来源的劳动收入、养老金、家庭供养三者间的结构,使之不过分倚重单一来源。通过探索将个体特点、经济保障、卫生健康、代际关系等资源进行配置组合的不同路径,实现最优的养老经济意愿选择模式^[48]。一方面,优化基本养老保险制度,以组合拳方式调整基本养老保险相关参数,例如逐步提高最低缴费年限、适度降低养老金替代率等。同时加快实现职工养老保险全国统筹,健全中央对地方的激励约束机制与责任分担机制^[49]。另一方面,建立老年人再就业监管平台,实行电子化实时跟踪服务,完整记录个体特征、就业信息、健康状况、工作时长等,尤以对从事高体力劳动、有损身体机能的就业者和高龄劳动者予以劳动时长的限制和健康保护。

再次,针对个体资源禀赋能够弱化劳动参与对老年人生活满意度综合指数负面影响的现象,应采取有效措施强化其效果。在收入分配与再分配过程中注重居民家庭相对地位的改善,合理引导消费模式满足多样化消费需求。通过“银发产业”带动银发消费,有针对性地开发因人口年龄结构调整导致的产品需求,出台相关减税免税的政策扶持老年产业的发展,以充分挖掘老年人口的消费潜力^[50]。拓展养老应用场景,使养老服务与养老应用场景有效契合,着眼于老年人的日常起居、衣食住行、医疗救助、情感互动、社会交往等生活场景的具体特点,将适老服务有机融入其中,形成对老年人更加友好、更加便捷的生活场域和与之相契合的社区居家养老服务^[51]。

注释:

①参见第二次老龄问题世界大会发布的《马德里老龄问题国际行动计划》, <https://documents-dds-ny.un.org/doc/UNDOC/GEN/N02/397/50/PDF/N0239750.pdf?OpenElement>, 2002年4月8日。

②老年人社会参与具体包括:参与社会经济发展活动;家务劳动;社会文化活动;参与社会人际、旅游活动;在家庭范围内参与文化娱乐活动五个方面,其中第一项属于第一层次、中间三项属于第二层次、最后一项属于第三层次。参见杨宗传:《再论老年人口的社会参与》载于《武汉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0年第1期。

③15岁以上人口劳动参与率数据来源:《中国社会统计年鉴总编十三——国际资料》, <https://navi.cnki.net/knavi/yearbooks/YSJDD/detail>, 2011-2020。劳动参与率指经济活动人口(劳动力)占劳动年龄人口的百分比。年均增长(下降)率:亦复合增长率,指一定年限内平均每年增长的速度,计算公式为 $[N\text{次根号下}(\text{末年}/\text{首年})]-1$, $n=\text{年数}-1$ 。

④根据《中国劳动统计年鉴-综合》数据整理计算所得;同比增长率指和上年同期相比较的增长率。

⑤Dinner将认知和情感看作主观幸福感的两个基础维度,在认知因素中,总体生活满意度又被直接称为幸福感。参见Dinner E.《Subjective Well-being》,载于《Psychological Bulletin》1984第3期第95卷。

⑥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中国民生指数研究》课题组(2015)自2010年起,基于课题组所构建的“中国民生改善指数”,进行了第一个基于大样本调查的民生改善评价,并着重分析了公众的主要民生诉求。该调查涵盖对全国31个省级行政区逾5万个样本的电话调查和8个省近万个样本的入户调查,是迄今为止国内规模最大、涵盖范围最广的关于城乡居民生活满意度和民生满意度的调查。民生客观指数包括居民生活、公共服务、社会环境和生态文明4个一级指标,主观指标则是与之相对应的4项满意度。参见周绍杰、王洪川、苏杨:《中国人如何能有更高水平的幸福感——基于中国民生指数调查》载于《管理世界》2015年第6期。

⑦问卷中“家务劳动”具体包括种地、管理果树、采集农林产品、养鱼、打鱼、养牲畜以及去市场销售自家生产的农产品等;“非农劳动”包括挣工资打工、从事个体与私营生意、为家庭经营帮工等。“工作”不包括家务劳动和义务的志愿劳动。

参考文献:

- [1]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加强新时代老龄工作的意见[EB/OL].http://www.gov.cn/zhengce/2021-11/24/content_5653181.htm,2021-11-24.
- [2]陆杰华,韦晓丹.劳动力老化对经济发展的影响机理及其战略应对[J].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研究,2022(3).
- [3]陆杰华,刘芹.中国老龄社会新形态的特征、影响及其应对策略——基于“七普”数据的解读[J].人口与经济,2021(5).
- [4]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2020年度国家老龄事业发展公报[EB/OL].<http://www.nhc.gov.cn/ljks/pqt/202210/e09f046ab8f14967b19c3cb5c1d934b5.shtml>,2022-10-24.
- [5]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2020年我国卫生健康事业发展统计公报[EB/OL].<http://www.nhc.gov.cn/guihuaxxs/s3586s/202207/51b55216c2154332a660157abf28b09d.shtml>,2022-07-12.
- [6]杜鹏,谢立黎.中国老年人主要生活来源的队列分析[J].人口与经济,2014(6).
- [7]吴振云.老年心理健康的内涵、评估和研究概况[J].中国老年学杂志,2003(12).
- [8]李江一,李涵.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对老年人劳动参与的影响——来自断点回归的经验证据[J].经济学动态,2017(3).
- [9]黄文杰,吕康银.“退而不休”对老年人主观幸福感的影响——基于CHARLS数据的实证分析[J].税务与经济,2020(3).
- [10]最建亮,吴玉锋.劳动幸福还是休闲幸福?——“无休”状态对农村老人主观幸福感影响的实证分析[J].江汉学术,2021(5).
- [11]王莉莉.中国老年人社会参与的理论、实证与政策研究综述[J].人口与发展,2011(3).
- [12]万芊.城市低龄老年人再就业促进研究——基于上海市的调查[J].社会科学研究,2013(6).
- [13]毕红霞,杨晓彤.什么主导了农村老年人劳动参与率持续提高?——基于CHARLS数据的研判[EB/OL].<http://kns.cnki.net/kcms/detail/11.3513.s.20210802.1511.008.html>,2021-12-04.
- [14]童玉芬,廖宇航.健康状况对中国老年人劳动参与决策的影响[J].中国人口科学,2017(6).
- [15]张文娟,赵德宇.城市中低龄老年人的社会参与模式研究[J].人口与发展,2015(1).
- [16]龚红,罗岩,彭姗.技术进步对老年再就业产生了“补偿”还是“侵蚀”效应? [J].中国软科学,2017(11).
- [17]徐智华,吕晨凯.积极老龄化背景下的老年人再就业权利法律保护路径研究[J].河南财经政法大学学报,2021(2).
- [18]谢立黎,王飞,胡康.中国老年人社会参与模式及其对社会适应的影响[J].人口研究,2021(5).
- [19]欧阳雪莲,陈勃,罗照盛.老年人社会适应性与主观幸福感的结构关系[J].心理学探新,2009(5).
- [20]蒋志学,刘丽,赵艳霞.老年人生活质量指标体系探析[J].市场与人口分析,2003(3).
- [21]曾毅,顾大男.老年人生活质量研究的国际动态[J].中国人口科学,2002(5).
- [22]李炜.社会公平感:结构与变动趋势(2006—2017年)[J].华中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9(6).
- [23]李建新,刘保中.城乡老年人口生活满意度差异及变化分析——基于CLHLS项目调查数据[J].学海,2015(1).
- [24]李建新.社会支持与老年人口生活满意度的关系研究[J].中国人口科学,2004(S1).
- [25]周绍杰,王洪川,苏杨.中国人如何能有更高水平的幸福感——基于中国民生指数调查[J].管理世界,2015(6).
- [26]杨红燕,郭荣荣,陈鑫.老年人民生问题感知:现状、分类及影响因素——基于CFPS与统计数据的主观考察[J].江淮论坛,2020(6).
- [27]穆滢潭,原新.居住安排对居家老年人精神健康的影响——基于文化情境与年龄的调解效应[J].南方人口,2016(1).
- [28]高敏,李延宇,王静茹.老年人生活满意度的影响因素与提升路径分析——基于中国老年人口健康状况调查数据的研究[J].老龄科学研究,2015(11).

- [29]宋宝安,于天琪.城镇老年人再就业对幸福感的影响——基于吉林省老年人口的调查研究[J].人口学刊,2011(1).
- [30]李亚雄,苟延峰.农村劳动力市场模式与老年人的“再就业”——鲁北乙村一个老年建筑队的案例[J].湖南社会科学,2015(1).
- [31]刘素素,庄明莲.城市老年人退休后的角色适应与老有所为:香港社区老年人的定性研究[J].社会工作,2014(4).
- [32]姜向群,刘妮娜.我国农村老年人过度劳动参与问题研究[J].中州学刊,2013(12).
- [33]许玲丽,龚关,艾春荣.幸福,赚钱还是花钱? [J].财经研究,2016(6).
- [34]邓大松,杨晶.养老保险、消费差异与农村老年人主观幸福感——基于中国家庭金融调查数据的实证分析[J].中国人口科学,2019(4).
- [35]饶育蕾,冀希,许琳.享受型消费是否提高了居民幸福感? ——基于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的实证分析[J].消费经济,2019(2).
- [36]郑方辉,卢扬帆,覃雷.公众幸福指数:为什么幸福感高于满意度? [J].公共管理学报,2015(2).
- [37]任栋,夏怡凡,孙怡.民生满意度指数研究——以四川民生满意度指数分析为例[J].财经科学,2015(2).
- [38]张玉,魏华波.基于CRITIC的多属性决策组合赋权方法[J].统计与决策,2012(16).
- [39]毛雅倩,李九全.基于家庭生命周期理论的老年人日常生活圈情境研究——以西安市为例[J].地域研究与开发,2020(2).
- [40]黄秀女,郭圣莉.城乡差异视角下医疗保险的隐性福利估值及机制研究——基于CGSS主观幸福感数据的实证分析[J].华中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6).
- [41]李德明,陈天勇,吴振云.中国老年人的生活满意度及其影响因素[J].中国心理卫生杂志,2008(7).
- [42]王永梅,孙月.我国居家养老服务惠及群体与发展趋势研究——来自三期CLASS数据的微观实证[J].中共福建省委党校(福建行政学院)学报,2021(6).
- [43]黄宏伟,展进涛,陈超.“新农保”养老金收入对农村老年人劳动供给的影响[J].中国人口科学,2014(2).
- [44]慈勤英,程燕蓉.以家为本,老而不休:农村老年人口劳动参与的家庭因素影响分析[J].天府新论,2022(6).
- [45]万媛媛,曾雁冰,方亚.劳动参与对退休老年群体健康的影响研究[J].中国卫生政策研究,2021(1).
- [46]黄乾,于丹.延迟退休会损害健康吗? ——基于对退而不休的研究[J].人口与发展,2019(2).
- [47]吴伟炯.工作时间对职业幸福感的影响——基于三种典型职业的实证分析[J].中国工业经济,2016(3).
- [48]王武林,陈瑶.谁来养老:中国老年人养老经济意愿及影响因素研究[J].中共福建省委党校学报,2018(1).
- [49]郑功成.面向2035年的中国特色社会保障体系建设——基于目标导向的理论思考与政策建议[J].社会保障评论,2021(1).
- [50]王勇,周涵.人口老龄化对城镇家庭消费水平影响研究[J].上海经济研究,2019(5).
- [51]尹德挺.积极培育养老新业态[N].人民日报,2021-08-30.

[责任编辑 林娜]